

電郵:tkporg@takungpao.com 傳真:28345135

鄧公憂患意識警示後人

秦曉鷹



有話要說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 105 周年。某些單位發起舉辦了《永遠的小平》影視展。除了播放故事片《百色起義》、《鄧小平》以及《大決戰》中的有關情節外，當然還要播出不少有關鄧公的電視劇、影視紀錄片等等。但這些影視資料是否就能構成「永遠的小平」這五個字中最有份量的「永遠」二字呢？我看未必。

因為，有些歷史的功績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功績變成陳跡的現象同樣多得不足為奇，更有甚者，回憶還會發生演化、變形、甚至扭曲：譬如一些當時看似痛苦的東西，當被後人談起時，卻不知何時變成了「美好的回憶」。而一些當時看似美好的事物，隨着時代的發展還會成為痛苦的沉思。我記得在讀鄧公文選時，鄧小平自己也曾非常豁達地說過，將來我的東西無人看了就說明社會又進步了。可見，世間許多人所期盼的許多所謂「永遠」其實是不存在的。

永存憂患意識

因此，我們今天說「永遠的小平」，就要釐清什麼可以續之久遠，什麼可以加以封存，又有什麼可以遺忘。以筆者之一孔之見，在鄧小平先生留下的政治精神遺產中，真正稱得上「永遠」的是他那種建立在對中國與世界大局格準確判斷基礎上的憂患意識。

改革開放之初，他憂患的是中國的落後所導致的「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出訪日本美國之後，他對於中國的「球籍」問題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一個東方大國卻沒有強國國力的現實，使鄧公那一代人痛心疾首。正是出於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及由此引發的急切，鄧小平才會把發展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才會堅決地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才會逢會必談、逢人必講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也才會主張摸着石頭過河、主張「不爭論」，聚精會神去搞建設。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戰後雅爾塔冷戰格局的結束，使鄧公既看到了危機又看到了機遇。儘管由於蘇東劇變和中國的政治風波使某些人把反和平演變視為工作主脈，但鄧公卻判定「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的基本趨勢。他的著名南巡講話就是這種心路的鮮明寫照。鄧小平在深圳珠海一再叮囑地方領導人「你們要快一點」。在上海過春節，他也不忘提醒產業工人「世界給中國發展留下的時間不多。」為此，他再次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並且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憂患與急切之情躍然紙上。

鄧公退休之後及謝世之前，是否就成了舍給弄孫閉門謝客的寓公了呢？當然不是。從最近一篇引起國內理論思想界普遍關注的文獻中，可以看到，鄧公的憂患意識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還有所加強，其一針見血的程度，至今仍使人感到這位老人思想的犀利與鋒芒。

勇於面對現實

這份文獻就是鄧小平在 1993 年 9 月與其弟鄧璽的談話。在這篇談話裡，鄧小平這樣說：「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兩極分化已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小部分人獲得了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公的這段話有三層含義：其一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執政黨和決策者遇到的矛盾和問題並不比此前不發展時要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話）；其二是國家發展起來以後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存在財富分配懸殊、小部分人佔有多數財富的問題；其三是國家必須利用各種（不是一種）手段方法方案（包括政策法規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否則，總有一天會出亂子。

雖然這些話帶有私人交談的味道，但卻反映出鄧公晚年仍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也是老人家勇於面對現實的一貫作風的體現。不過，要說到「永遠的小平」，筆者以為更應該從實質上吸收老人這極富預見性和戰略性的思維成果。因為，他的這些帶有警示性的見解正在今天的中國現實生活中不斷得到印證。記住這些話，「永遠的小平」才能拂去歌舞昇平的輕曼，留下永遠的清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自馬英九上台以來，國共的和解，進入新階段，大陸與台灣的交往，升上高層面。就在一片喝采聲中，「莫拉克」颱風來了，毀滅的不只台胞的生命財產，還殃及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危及馬英九的政治前途。因此大陸方面絕不能隔岸觀火。目前最須關切的，是今後國民黨的走向，馬英九的前途。從風災所見，今日馬英九以至國民黨所欠缺的是應變力、危機感，最不幸的是封閉性。

封閉心態殘存

自五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奉行的是強人政治，島內不容許有異見聲音或反對黨派。蔣經國在八十年代後期推行開放政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在兩岸同時進行，不同樣的可能是模式而已。同時推行的是技術官僚管治，保送精英到美國留學，然後回到政府實習；連戰、宋楚瑜以至馬英九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亦是國民黨與民進黨最大的差別。二〇〇〇年國民黨下台，大部分精英被迫下崗，有投身商界，亦有進入學院。馬英九便曾執教政治大學，可幸很快當上台北市市長，為日後執政鋪路。

馬英九以外還有一些留在黨部的幹部，經歷了八年，亦蝸居了八年，較少受到政治的洗禮，亦較少與社會正面接觸。到了馬英九奪回政權，他們便坐享其成，重新上位。而馬英九重新任命的，大部分都是國民黨遺臣，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便升任「行政院」院長，前陸委會主委蘇起，便改任國安會秘書長，至於蕭萬長，可以說是遺老。這些新秀與遺老，有部分不能保留以往的衝動，更有部分不能適應新的環境，何況是突如其來、威力空前的風災。

最值得關心的，還是六十年來，仍然殘存於國民黨內的封閉心態。國民黨選台以後，便出現一個偏安的局面。台北的繁榮，就有如南宋的臨安，蔣介石整天在堅持「反攻大陸」，結果是兩岸隔絕，人民亦變得麻木。蔣經國奉行「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後期才開放台胞赴大陸，但這種一線牽的開始，又被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所破壞，隨後陳水扁喊出「一邊一國」，加深了島民意識，亦促成了封閉心態。馬英九上台只有一年，很難驟然改變了這種心態。如是這場突如其來的颱風「莫拉克」，竟然完全暴露出，整個台灣政界亦存在着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的表現又是怎樣呢？是完全拒絕外援。



十七家中央新聞單位的百名編輯記者日前抵達井冈山，開始「中央新聞單位名記者名編輯江西老區行」活動，他們換上紅軍裝，重走著名的紅軍挑糧小道。

韓在半島局勢上要兩手

歐陽觀

接見玄貞恩，產生了平壤樂意大力推進半島和平局勢的正面回應，其三則是金大中逝世為平壤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機會，令金正日有了很好的回應理由。

金正日與玄貞恩主要就開展離散家屬團聚等五項交流事業達成協議。這既符合玄貞恩身份又最迎合韓國輿論。在消息傳出之後，韓國媒體的確對玄貞恩訪平壤取得成果讚揚之聲甚高，甚至有輿論認為，玄貞恩以民間身份獲得的成功，較之金大中當年取得的成果更大，可能是最能導致半島真正和平的導線。足見這次朝鮮半島和解跡象給予世界的期望有多高。

推動南北民間合作

據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南北兩方會盡快公布一系列有利於雙方民間交往的實質性措施，包括：宣布盡快重開金剛山旅遊，平壤方面將採取措施保障旅遊便利和安全；平壤將按照原狀恢復韓國人員通過軍事分界線的陸路通行和在朝方一側的停留時間；雙方將立即恢復開城旅遊，並搞活開城工業園區；現代集團將在完成準備工作後開始進行白頭山（長白山）旅遊項目；雙方今年中秋節時在金剛山地區舉行離散家屬團聚活動。

不要小看這些民間的動作，它既符合玄貞恩的身份，也表示了朝鮮對韓國民間意願的尊重，而且這些都是此前逐步展開的項目，風險不大，也都在雙方能夠及時控制的範圍之內，合作起來不但有駕輕就熟之便，也有順理成章的理由。至於韓國，在玄貞恩訪問平壤並發表了以上聯合公報之後，也及時表達了支持意向，說明玄貞恩此行並非真正的民間身份，代表的是韓國政府的意願和行為。韓國統一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韓國現代集團與朝鮮亞太和工委會達成的五項協議值得積極評價。但在這種清晰的表述之後還加上仍屬於「民間層面的協議」，就被批評為無此必要。其實，誰都看

透韓國政府在背後扯線的事實。

韓國政府之所以要採取這樣的做法有一個很重要原因，即既希望從半島局勢解凍上獲得世界讚譽，也希望藉此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不要以為美國一定要牽制韓國，作為對抗朝鮮的一隻棋子，其實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美朝緊張關係，對於美國的利益或者形象都有不小的衝擊。美國既有這樣的希望又不便親自出面說白，善打邊爐的韓國政府正因為在數十年與美國的交往中看透了這種心態，才做出看似與美國利益相逆背、實則暗地裡受到美國唱好的行為。這正是所謂「知君所好莫若妄」的心態暴露。

平衡與美朝關係

因此，韓國在玄貞恩打通了與平壤的通道之後，便馬上做了一系列傾斜於美方的行動：同一時間與美國舉行名為 2009 年度「乙支自由衛士」的聯合軍事演習，還特別選擇了在韓國境內舉行，將國際視點再扯回到韓美關係上來，起着平衡玄貞恩與平壤達成和解可能出現的不必要衝擊。

韓美在這次演習中，首次使用新的共同作戰聯合防禦體制，被認為是韓國在為 2012 年美國將戰時作戰指揮權移交給韓方的一種預演式交接行為。同時也向美國表示，即使未來韓國與平壤建立良好關係，美軍撤出韓國之後還會保持韓美的密切關係。韓國的態度和做法美國應該完全放心。

說透了，其實這是韓國在要半島利益上的兩面手法，更可以說是韓國出於自身利益必然採取的行為。如果韓國一面倒積極與平壤建立起和洽關係，難免受到西方社會責難，令韓國在世界建立起來的經濟利益大受損害，得不償失。另一方面，韓國不希望看到金大中建立起來的半島陽光局面十年過去無法持續，在評估以援助手段與平壤建立關係，以及半島關係解凍韓國可以首先得益之下，保持與平壤的關係顯得必要而且重要。這才是韓國為什麼高調利用金大中葬事事件，達到同時平衡與平壤及美國關係的原因。

以情代法「不可取」

張忠文



成都中院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安全罪」一審判處酒後無證駕車致 4 死 1 傷的肇事人孫偉銘死刑，南京酒後駕車撞死 5 人的張明寶以同一罪名被捕入獄。一時間，「酒後駕車肇事該當何罪」「孫偉銘該不該殺」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動靜大的有：成都 5 律師上書要求刀下留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在《新京報》發表長文，指出酒後（醉酒）駕車撞死人純屬「交通肇事」，最高只可判 7 年，斷不可處死。而最吸引眼球的則是鳳凰衛視「一虎一談」節目的一場大辯論。

酒後駕車惹關注

交通安全是個大問題，酒後駕車尤其惹人關注。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 107193 起，死亡 29866 人，直接財產損失 4.1 億元。2007 年全國酒後駕車致死 3435 人，佔事故總死亡人數的 4.21%。而今年 8 月 15 日晚，武漢市在 90 分鐘的嚴查中竟查出 87 人醉駕或酒後駕車。正由於此，鳳凰台的辯論才有樣本性價值，不但真實地反映出現實中國社會對這類事件的民情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法治建設的現狀和弊端。

辯論場上，主殺派明顯地佔上風。事後的網上跟帖更能說明這一點：主殺派 1240 人，反殺派 222 人，雙方力量對比幾近 6：1。

請看主殺派的觀點：明知酒後不該駕車卻偏要駕車，就是故意犯罪，就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血債是不可欠的，撞死一個人也要償命；判肇事者死刑，可以安慰受害者家屬，讓逝者安息，這才算討回了公道。其中一位憤青（《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王小東）尤為怒火中燒、氣勢逼人。他說：「法學專家的『理性』無權凌駕於公眾的『感情』之上。」「我信不過他們，憑什麼他們說了算？」「強調『理性』高於『感情』是毫無道理的。」他還滿臉不屑地當面攻擊法學家：「把『理性』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標榜自己『與文明的外國更接近』，完全是『裝蒜』。」

酒後駕車奪人性命，當然可恨，但可恨歸可恨，量刑歸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隨情轉。如按那位憤青的主張，管你法是怎麼定的，只要民眾怨恨就可「殺無赦」，豈不天下大亂了？還談什麼法治國家，乾脆改為情治國家算了。

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必須立法在先、依法斷案、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既然酒後駕車肇事被定性為「交通肇事罪」，而刑法第 133 條又明確規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為 7 年，那怎麼可以因為群情激憤便隨意升格，把它和往井水裡投毒、在森林裡放火、向人群扔爆炸物相提並論，把該判 7 年刑的孫偉銘們視同「放火投毒犯」殺掉呢？「故意酒後駕車」絕不能和「故意駕車殺人」劃等號。如果地開法律，以情定讞，把「故意殺人」和「非故意殺人」一鍋煮，那是拿法律開玩笑，而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以情代法」釀大禍

孫偉銘死活事小，法律尊嚴事大。盡人皆知，我們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體現的是「全民意志」。把嚴肅的「法」和民衆的「情」對立起來，對法學家的理性和專長橫加攻訐，實在是蠻不講理。當然，法律條文可以修改，對交通肇事罪的刑罰可以加重，但重也要有「度」，斷不可開殺戒。須知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包括給他人、給社會造成禍害的罪人。「除惡務盡」是對的，但這不等於「逢惡便殺」，應該把「惡行」和「作惡之人」區別開來。對人，還是要挽救。

其實，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屢屢發生，根本原因還不是刑罰太輕，而是在犯罪源頭執法不嚴，往往以情（親情、錢情、官情）代法，縱容了孫偉銘、張明寶們。以孫偉銘為例，他在肇事前半年內已有至少 10 次違法駕車記錄，如果每次都嚴格執法，處 15 日拘留並處 200—2000 元罰款，他還會長期多次無證駕車上路以至釀成大禍嗎？與其他有證違法者則有「暫扣數月駕照」的罰則，也應能剋住酒後駕車歪風。

滅火要滅火星，固堤要堵蟻穴。打擊各類犯罪，關鍵是防微杜漸。對酒後駕車，完全應該像有些國家那樣實行「零容忍」，沾酒就不許駕車上路，違禁便依法嚴管，毫不通融。這樣，日久成習，酒駕、醉駕自然就絕跡了。而我們的管理恰恰在「禍源」階段偏鬆，有路子的，只要沒闖大禍，總能輕輕地被撈出來，於是便更加肆無忌憚了。環顧四周，這種「撈人」事件可說無時不在上演。此風不利，法律條文嚴上百倍，也將於事無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